

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周立群^a, 周晓波^b

(a. 南开大学 滨海开发研究院 b.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政府在放松生育政策的同时,配合退休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延迟退休和生育调整的理论模型发现:从劳动力增量看,延迟退休能够产生即期效应,而生育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且两者导致的劳动力增量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2031年;从社会总负担看,在实行延迟退休后,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位置;从总产出看,同时实施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政策,经济中潜在的福利损失最小;从产出增速看,放开生育的同时配合延迟退休,经济增速下降最慢;从人均产出看,放开生育的同时最好配合延迟退休,否则人均收入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不变时效果。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延迟退休政策;人口红利;生育政策调整;抚养比;经济增长;婴儿潮;代际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F24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6)05-0093-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之后,20世纪8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人员基本进入劳动力市场,而20世纪90年代生育低谷时期的人员(1987年之后历年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按照如今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岁计算,中国最大的“婴儿潮”,即1960年后出生的世代人员即将开始步入退休,人口世代的更替引致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见图1),社会总负担开始上升,这将意味中国劳动力开始短缺,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开始消失,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低速常态。这种少子化和老龄化在同一时期内的相互叠加将会给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养老服务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除此此外,人口结构的代际不平衡还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正如美国著名人口学家David和Jeffrey所论述的: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和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条件^[1]。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未富先老。邻国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到现在的低迷经济的前车之鉴不能不使我们警惕。如果政府对上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应对不足,也必将会制约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正因如此,媒体和学术界关于是否放开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越来越多。

二、文献回顾

自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基本服从“平均每10年提高2.5岁”的规律,直至目前仍然没有减缓的迹象,而我国自1970年以来人口寿命预期也一直稳定地增加,速度大约是每10年增加2.74岁,略高于发达国家^[2]。一方面,人均寿命的延长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人均寿命普遍延长的背景下退休年龄仍然保持不变大大降低了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尽管我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定退休年龄,即男性和女性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分别为60和55岁,但实际退休年龄远远小于这个数字,企业职工仍然普遍存在提前退休和内

[收稿日期]2016-0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JL113)

[作者简介]周立群(1951—),男,山东青岛人,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学研究;周晓波(1988—),男,安徽六安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人口与金融研究。

部退休的现象,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闲置率,也加剧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因此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完善目前的退休方案。此外,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如金刚认为,延迟退休能在生育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使得当期和未来每期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增加,从而降低老年抚养比,延长人口红利期,在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和经济增速均会提高。余君军认为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但

中短期内会降低劳动力质量,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分为4个阶段:2015—2027年,经济增速先降低;2028—2035年,经济增速提高;2036—2040年,经济增速再降低;2041—2055年,经济增速开始趋于平稳^[3]。樊长科、林国彬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有利于提高养老金的支出水平,但劳动力增加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和生产效率的下降,总产出在长期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4]。邱瑾、周涛发现,延迟退休年龄不仅不会对新生劳动力就业造成挤压,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局部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从而起到促进经济的增长、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正面效果^[5]。祁鼎等研究发现,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多没有减少社会总消费,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促进了社会总消费的增长^[6]。总体来看,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效应的研究结论占大多数,同时在长期和短期延迟退休的效果不一样。

放松生育政策的确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是学界关于是否放松生育政策以及放松生育政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长期影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刘永平基于迭代模型和家庭养老的假设研究发现,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国当前不适宜实施放松生育的政策^[7]。陈璋等发现,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太可能对中国未来年均经济增长7.2%的目标实现构成较大障碍,而可能的障碍应是资本存量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速增长^[8]。陆昉和蔡昉在没有考虑养老的情景下,对不同的人口调整方案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如果不改变现有人口生育政策,人口数量虽然在中短期内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没有影响,但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如果到那时(2035年)再调整现有生育政策,反而会导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降低,故如今要尽快放开生育^[9]。Liao在养老是完全自养的情景下,发现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了人力资本累计率,增加了人均产出^[10]。

然而已有研究在考察生育政策对产出及人均产出的影响时,要么直接不考虑延迟退休,要么把延迟退休当作一外生变量,而很少在不同的生育政策下考察不同的退休政策对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影响。此外,把生产部门和家庭部门这两部门打通,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是较少。在研究背景上,很少有研究把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对产出影响的考察放在人口世代更迭的背景中去,如中国最大的婴儿潮,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世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20世纪90年代的生育低谷人员开始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研究方法上,虽然存在应用跨期优化的处理方法,但构造模型研究生育和退休政策对生产部门和家庭部门影响较少;在研究模型上尽管存在采用世代更迭模型研究人口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然而世代更迭模型更适合中长期的分析,如一期25年左右,故此模型对于短期和中期的分析并不合适。在模型设定上,本文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如我国的生育行为严格受到生育管控,我国的储蓄更多是由家庭内生选择的。本文基于不同的生育水平,在储蓄由家庭部门内生决定以及生育严格受到管制的前提下,采用动态优化的方法考察生育制度和延迟退休方案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最后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尝试去甄选合适的延迟退休和生育制度。

三、理论基础、模型设定和参数校准

(一) 理论基础

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对劳动力总数和资本存量的影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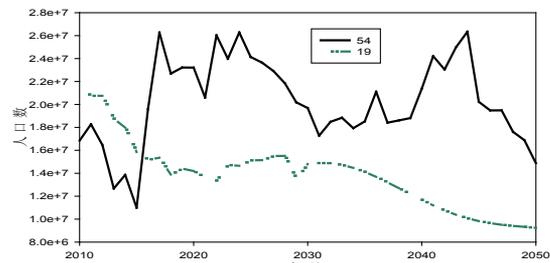


图1 未来历年新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单位:人)

产生作用。依据索罗增长模型可知,当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时,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来源于社会储蓄的转化。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可以很好解释延迟退休提高社会储蓄的原因:人口结构中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会影响社会总消费和总储蓄,当青少年与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越高时,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就越高,储蓄倾向就越低;当中间年龄群体比重越高时,社会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储蓄倾向就会越高。而延迟退休会减慢老年人口过早进入消费大于储蓄的时点,具体来说,延迟退休能够在当期提高劳动力总量,减少老年抚养比,延长人口红利期。即延迟退休有助于老年人生产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结果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从而提高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与延迟退休不同的是,生育政策调整短期内会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口抚养比、降低社会储蓄率,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长期会增加社会劳动力总量,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生育率调整后出生的人口世代长期将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人口红利得到不断释放,社会总生产和储蓄会增加,结果导致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从而提高了潜在经济增长率。

(二) 模型设定

任何一期的人口都可分为三种类型:青少年、成年劳动力以及老年人口。青少年当期不参与社会劳动,同时不存在任何决策,维持生命的消费仅来自父母对其的抚养,而下一期部分青少年变成成年。成年劳动力当期供给劳动力获得工资性收入,社会决策由成年劳动力做出,其决策是如何把当前的劳动收入在消费、储蓄、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之间进行分配,实现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而在下一期一部分成年劳动力变成老人。老年人口不参与社会劳动和社会决策,当期消费来自子女的抚养费以及自己年轻时的储蓄,并在下一期一部分老人去世。成年劳动力效用函数包括两项:当期消费带来的效用流和下一期收入回报带来的效用流。我们假设一个家庭仅有一个成年劳动力。本文效用函数设定跟随 Barro 和 Becker^[11] 以及杨华磊等^[12] 的设定,消费的弹性是 σ ,下一期收入回报的效用折现到当期的折现系数为 β ,对一个老人赡养的支出占一个劳动者工资的比例为 ϕ ,抚养一个子女的支出占工资的比例为 μ ,当期的消费、储蓄以及下一期的收入为 C_i^1, S_i 以及 C_i^2 ,当期青少年人口数量、成年劳动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以及将要退休的人口数量为 H_i, L_i, Q_i 以及 $p_i(54)$ ($p_i(64)$),当期工资水平、下一期的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分别为 w_i, w_{i+1} 以及 r_{i+1} ,政策生育水平即生育水平上限为 \bar{n} 。

约束条件为,假设劳动人口在第 i 期的总劳动收入为 $L_i w_i$,这些收入在当期用于以下各项支出:消费为 C_i^1 ,储蓄为 S_i ,抚养子女的费用 $H_i \mu w_i$,抚养老人的费用 $\phi w_i O_i$ 。 C_i^1 是当期收入在当期发生的消费。当期储蓄 S_i 在下一期将给储蓄者带来 $S_i(1+r_{i+1})$ 的收入回报;当期赡养老人的 $\phi w_i O_i$ 费用和抚养费 $H_i \mu w_i$ 将在下一期给出资者带来 $(H_i \mu w_i + \phi w_i O_i) \left(1 - \frac{p_i(54)}{L_i}\right) + p_i(54) \phi w_{i+1}$ 单位收入,如果采取延迟退休的方案,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收入回报中的 $p_i(54)$ 被换成 $p_i(64)$ 。储蓄和赡养老人费用在下一期产生效用流。以平均退休年龄 55 岁为例,在家庭养老制度下,在维持延迟退休不变的前提下,每一期劳动人口在每一期最终面临的规划是,如何选择当期的消费水平 C_i^1 和储蓄水平 S_i ,来实现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我们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整理得:

$$s. t. \begin{cases} \text{Max} U_i = (C_i^2)^\sigma + \beta(C_i^1)^\sigma \\ L_i w_i = C_i^1 + S_i + H_i \mu w_i + O_i \phi w_i \\ C_i^2 = S_i(1+r_{i+1}) + (H_i \mu w_i + \phi w_i O_i) \left(1 - \frac{p_i(54)}{L_i}\right) + p_i(54) \phi w_{i+1} \\ 0 \leq \sigma, \beta, \phi, \mu \leq 1 \end{cases} \quad (1)$$

上述模型仅是考虑家庭的决策,没有考虑生产的决策。我们不妨设生产函数为 C-D 生产函数,进一步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贡献份额 α 是一个给定的量,全要素生产率 A 是一个需要校准的量,则当期和下一期的生产函数为:

$$\begin{cases} Y_i = A(k_i)^\alpha (L_i)^{1-\alpha} \\ Y_{i+1} = A(K_{i+1})^\alpha (L_{i+1})^{1-\alpha} \end{cases} \quad (2)$$

根据生产者每期利润最大化条件,每期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资本的边际成本利率,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工资。资本的边际收益是生产函数关于资本的一阶导数,劳动边际收益是生产函数关于劳动的一阶导数。因为在我国是家庭养老,所以家庭的储蓄就是当期的资本增量,在不考虑资本折旧的情况,第*i*+1期的资本量*K*_{*i*+1}等于第*i*期的资本*K*_{*i*}加上第*i*期的储蓄*S*_{*i*},最终我们设定资本运动方程为:

$$K_{i+1} = K_i + S_i \quad (3)$$

资本的运动方程保证了模型动态化的实现,在这里我们把第*i*期看作将要研究的基期。因为历年的人口结构数据根据不同的生育政策可以事前计算出,所以我们把上述资本运动方程分别带入下一期的生产函数之中。每一期的成年劳动力在家庭养老制度下,面临如何把每期的劳动收入最优地在当期消费、储蓄、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间进行分配,以完成当期收入的合理分配,实现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其决策变量是当期消费水平*C*_{*i*}¹和当期储蓄水平*S*_{*i*}。

$$s. t. \begin{cases} \text{Max} U_i = (C_i^1)^\sigma + \beta(C_i^2)^\sigma \\ L_i w_i = C_i^1 + S_i + H_i \mu w_i + \phi w_i O_i \\ C_i^2 = S_i(1 + r_{i+1}) + (H_i \mu w_i + \phi w_i O_i) \left(1 - \frac{p_i(54)}{L_i}\right) + p_i(54) \phi w_{i+1} \\ w_i = A(1 - \alpha)(K_i)^\alpha (L_i)^{-\alpha} \\ w_{i+1} = A(1 - \alpha)(K_i + S_i)^\alpha (L_{i+1})^{-\alpha} \\ r_{i+1} = A\alpha(K_i + S_i)^{\alpha-1} (L_{i+1})^{1-\alpha} \\ 0 \leq \sigma, \beta, \tau, \phi \mu \leq 1 \end{cases} \quad (4)$$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通过对上述方程(4)观察,在其他参数已知的条件下,根据生产函数,下一期的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取决于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和劳动人口数量,因为人口外生给定,所以未来任何一期的劳动人口数量事前已知。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取决于当期储蓄和当期的资本存量,在当期资本存量有已知变量且初始条件确定的情况下,下一期的利率和工资取决于当期的储蓄和其他已知参数。其二,模型的动态取决于资本运动方程和人口运动方程,由于人口运动方程外生给定,因此模型的动态化取决于资本运动方程,如果在第一期求出储蓄,就可以知道第二期的资本存量,如果知道第二期的资本存量,通过优化模型就可以求出第二期的劳动人口收入,进而求出第二期的储蓄,依次类推,可以求出未来不同生育和退休情景下的储蓄序列、产出序列、人均产出序列以及产出增速序列。其三,从贝尔曼方程来看,动态规划模型要存在最优解,每一期劳动收入的分配方案至少满足从当期和下一期综合来看是最优的,所以在进行动态规划的时候,需要下一期的变量。当然在现实中,每过一年,模型必须实行一次规划,每一次规划由每期的劳动人口做出,对上一期的资金结清来满足变化的人口结构。其四,如果其他都是已知的,把消费项确定之后,上述规划方程仅是含未知数*S*_{*i*}的一个非线性的隐函数。关于隐函数的求解通常较为麻烦,并且对于隐函数的求解,多以数值解的形式展示。基于此,我们在此不再求每年储蓄率的解析解,仅通过数值计算,给出模拟的数值解。由于在模拟数值解中,需要一定的参数和初始值的设定,在此,我们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以及校准,给出模拟前的初始值和参数设定。

(三) 参数校准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将初始条件设置为2010年,不同生育政策下未来历年各个年龄段上的人口数据采用杨华磊等的预测^[12]。本文主要考察两种延迟退休:一种是维持现在的延迟退休不变,平均的退休年龄是55岁;一种是延长退休,平均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根据上述人口数据预测和延迟退休的设定,我们可以计算出初始的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青少年、劳动力以及老年

人数量。根据古明明和张勇的研究^[13],2008年(基期为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149488亿元,为了以名义价格计算,我们需要通过固定资本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因为固定资本价格指数在统计年鉴上仅查到以1990为基期的2010年价格指数,在此以1978—1990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可以近似获得2010年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所以最终我们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的2010年的固定资本价格指数近似为594:100,2010年按照名义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投资近似为887958.72亿元。根据Liao的研究,本文设置资本的贡献份额为 $\alpha = 0.6$,劳动力贡献份额为0.4,同时仿照其进行校准的方法,因为2010年的名义GDP为401512.8亿元,为了使得含有人力资本的C-D生产函数与2010年总产值匹配,得到两种延迟退休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匹配值分别为0.030480126和0.028469967。

$$A = Y_t / [K_t]^\alpha (L_t)^{1-\alpha} \quad (5)$$

参照杨子暉和Barro及Becker的研究,同时考虑到中国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以及储蓄养老的传统文化,在此我们设耐心系数为 $\sigma = 0.95$,既跨期替代弹性为0.95^[14];根据黄宇以及Liao的研究,考虑到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对下一期消费赋予较大的权重,将引致折现系数设定为0.9^[10,15]。抚养一个子女的费用占工资的比例,参照Liao的研究工作,我们在此设定为 $\mu = 20\%$ ^[15]。在道德约束下抚养一个老年人占一个成年劳动力工资的比例近似为老年人口占比总人口的比例,2010年时的老龄化水平为10%左右,这也基本符合相关国际比较研究成果。

上述除决策变量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外,其他变量和参数一是外生给定,二是由生产者部门决定,三是由上一期和初始条件决定,四是通过初始校准获得。最终我们把每期的储蓄水平带入资本运动方程进行更新迭代。生育政策短期影响模型中的青少年人口数量,长期影响模型中的劳动人口数量。延迟退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老年人数量,我们在不同的退休和生育政策下,计算出每期的储蓄水平和资本水平,进而根据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其他已知变量,基于不同的原则和目标甄选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

四、延迟退休、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以及产出的影响

此节主要考察在不同生育政策和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甄选出合适的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搭配模式。根据上述的模型设定,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方案:其一,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简称TFR1.5),总和生育率TFR为1.5;其二,全面放开二胎(简称TFR2.0),总和生育率TFR为2.0。同样我们在此选择两种延迟退休方案:其一,维持现在的延迟退休方案不变(简称ARA55),平均退休年龄近似为55岁;其二,延迟退休方案(简称ARA65),在此采取分水岭式的延迟退休方案,即还没有退休的人员,统一把退休的年龄延迟到65岁。不同的延迟退休方案不影响青少年人口数量,仅影响劳动力数量和老年人口数量。同时,我们把既不延迟退休,也不实行生育政策调整,看作基准情景。下文我们在不同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下,考察劳动力人口数量和社会总负担的变化趋势;在不同延迟退休和不同的生育政策下,考察总产出、人均产出以及总产出增速上的差别;基于不同的政策目标以及人均产出、总产出和产出增速的长期和短期表现,总结出合适的退休和生育政策组合。

(一)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劳动力数量和社会总负担

从图2看出,在2010—2054年间,其一,无论在何种延迟退休方案下,2030年前维持生育政策与放开生育政策下的成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均相同,但2031年以后放开生育政策会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且增加幅度越来越大。其二,无论在何种生育政策或退休政策下,劳动人口数量都呈现倒U型的轨迹,峰值在2016年到达,这也就是蔡昉等学者所陈述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劳动力数量一直增加的时代结束^[9]。如在资本、技术等其他投入不变下,劳动力数量开始出现短缺。其三,无论是哪种生育情景下,延迟退休下的劳动人口数量都高于退休制度不变下的劳动人口数量。总体来说,在生

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成的四种政策组合中,延迟退休年龄下的劳动力数量增加的效果最为显著,并且是即时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增加的效果比较弱,且具有滞后效应,同时即时效应大于滞后效应带来的劳动力增量,而且两者导致劳动力增量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2031年。总体来看,实施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调整的搭配组合会使劳动力数量增加最多,而两者都不调整的政策带来的劳动力增量最小,只调整其一带来的劳动力增量处于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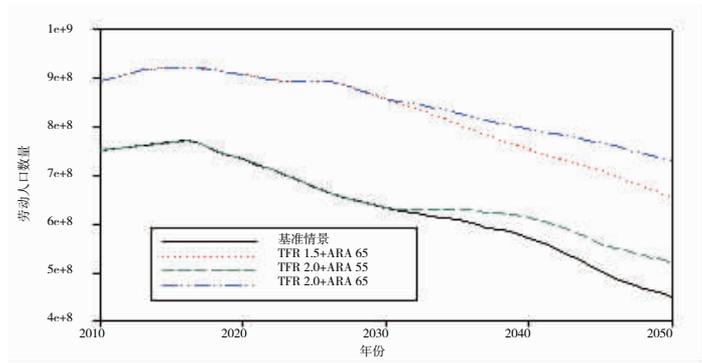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劳动力数量(单位:人)

从图3可以看出,无论哪种退休方案下,2010—2044年放开生育比不放开生育的社会总抚养比大,两者抚养比差距呈现先扩大后减小的趋势,2045年以后不放开生育比放开生育的社会总抚养比大,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因为放开生育政策短期内老年抚养比不变,少年抚养比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长期来看由于放开生育使得劳动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相比不放开生育来说会发生下降,从而社会总抚养比相对不放开生育来说会下降。整体上,无论哪种生育情景下,延迟退休的社会抚养比低于不延迟退休下的抚养比,因为延迟退休减少了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了劳动人口数量。总体来看,无论是否放开生育或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社会总抚养比都呈现一直上升的态势,而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后,社会总抚养比会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且上升的速度开始变得缓慢,因此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延迟退休年龄的确能够大幅度地降低社会总抚养比,且从长期来看,效果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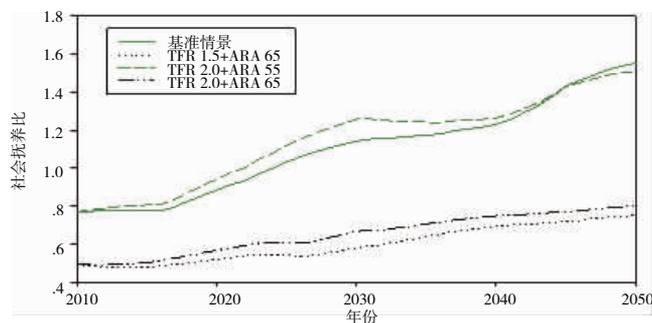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总社会负担

(二)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总产出

从图4可看出,无论是维持生育政策不变,还是放松生育政策,抑或实行延迟退休政策,总产出都在增加,且边际产出都在递减。其中,实行延迟退休的总产出水平普遍高于不实行延迟退休的,而且从长期来看,两者的总产出差距越来越大。无论在何种生育情景下,实行延迟退休方案下的社会总产出高于不延迟退休下的社会总产出,这源于延迟退休意味着增加参与生产的劳动人口,减少参与消费的老年人口,降低了老年抚养比,进而增加了社会储蓄和劳动人口数量,最终会提高产出。无论哪种退休方案,放松生育管制在短期轻微低于不放松生育管制下的社会总产出,长期却远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社会总产出。源于短期放松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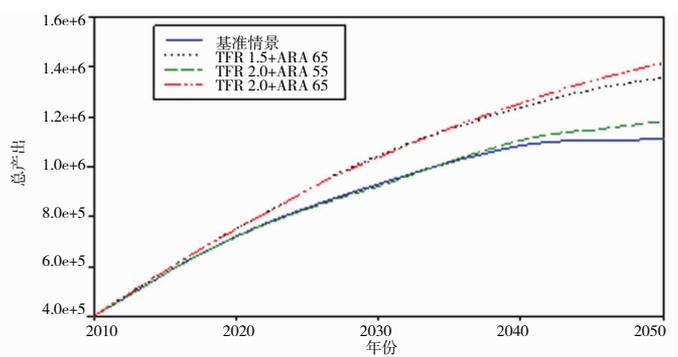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总产出(单位:亿元)

管制,在不考虑劳动参与率下会提高社会少年抚养比,降低社会储蓄,进而降低社会资本存量和产出;长期随着新出生的婴儿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人口增多,在老年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老年抚养比,进而增加了社会的储蓄份额、社会资本存量、社会产出。

总之,短期在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在避免短期产出下降的同时,又能提升产出。此外,长期来看,实行放开生育同时延迟退休政策的总产出增加最多,实行生育政策不变同时又不延迟退休的总产出增加最少。生育政策不变和延迟退休的组合下总产量增加比放开生育政策和不延迟退休的组合要大。这意味着,长期如果要放开生育政策,最好同时搭配延迟退休这一政策调整,否则经济社会中依然会存在较大的福利损失。

(三)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产出增速

如图5所示,无论在何种延迟退休方案下,还是在何种生育情景下,未来经济增速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性特征。这源于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引致20年后每年劳动人口增速逐年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我们采取堵住劳动力流出口的延迟退休方案,也无法改变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性特征。同时中国已经错过了放开生育的最佳时间,即在80后婴儿潮开始进入婚配或者育儿的时期。伴随着90后、00后出生低谷世代进入育龄年龄阶段,育龄妇女人数减少,所以当前即使放开生育,提高每个妇女的生育水平,新出生的婴儿总量还是减少,导致20年之后劳动人口增速依然保持下降的趋势,所以放开生育依然改变了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放开生育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速的绝对量,延迟退休可以降低经济增速下降的速度。从图5可以看出,放开生育短期对经济增速提高产出一个轻微的挤占,长期却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增速。因为短期,放开生育提高少儿抚养比,会降低储蓄,降低资本存量,降低资本增速,降低经济增速;随着新出生婴儿进入劳动力市场,会提高劳动人口的增速,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加储蓄,增加资本积累,进而提高经济增速。我们还可以看出,延迟退休的确提高了经济增速,因为延迟退休增加了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了老年人口数量,降低老年抚养比,进而增加社会的储蓄,提高资本积累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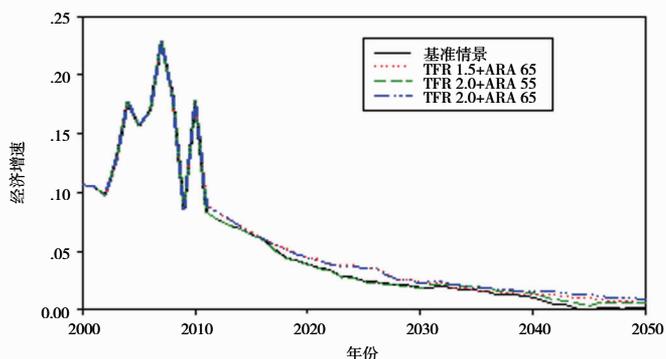


图5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产出增速

(四)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人均产出

从图6可以发现,在同种生育情景下,实行延迟退休比没有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对人均产出提高的幅度更大;在同种退休情景下,放开生育的人均产出低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人均产出。为什么延迟退休下的人均产出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人均产出呢? 因为延迟退休与不延迟退休下有相同的人口总量,但是延迟退休下的总产出高于不延迟退休下的总产出,所以延迟退休下的人均产出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人均产出。为什么放开生育下的人均产出低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人均产出呢? 短期放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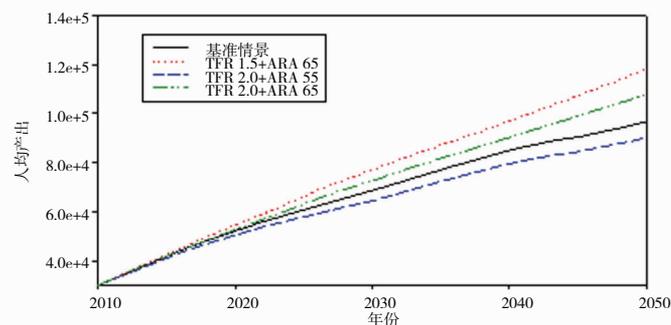


图6 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合下的人均产出(单位:元)

育增加了总人口数量,同时总产出轻微低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总产出,所以短期放开生育下的人均产出低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人均产出。为什么长期放开生育下的人均产出仍然低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人均产出呢?相比维持生育政策不变,虽然放开生育增加了未来的总产出,但是放开生育在增加未来劳动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增加了未来青少年人口数量。青少年是不劳动的,所以在使得分子产出变大的同时,分母不仅因为劳动人口增加变大,还因为不劳动的青少年人口数量增加变得更大,所以全面二孩政策长期还是降低了人均产出。总之,如果要放开生育政策,最好同时搭配延迟退休政策,否则从对人均产出提升的效果上看,比不上维持生育政策和退休政策不变的效果。

五、结束语

采用动态规划模型,我们发现:其一,从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政策组合下的劳动力数量角度看,在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组成的四种政策组合中,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增加的效果最为显著,而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增加的效果比较弱,而且两者导致劳动力增量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2031年。延迟退休的即时效应和生育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的双重叠加导致劳动力数量增加最多,两者都不调整带来的劳动力增量最小,只调整其中一个带来的劳动力增量处于中间。其二,从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社会总负担角度看,无论是否放开生育和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社会总抚养比都呈现一直上升的态势,在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后,社会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位置且上升的速度开始变得缓慢,因此在不考虑其他条件时,延迟退休年龄的确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我国的社会总抚养比,而且从长期来看,效果更加明显。其三,从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总产出角度看:实行放开生育同时延迟退休政策的总产出增加最多,实行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同时也不延迟退休政策的总产出增加最少;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但延迟退休比放开生育政策但不延迟退休的经济总产量大,这意味着如果要放开生育政策,最好同时搭配实行延迟退休,否则经济社会中依然存在较大的福利损失。其四,从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产出增速角度看,实行放开生育的同时延迟退休的政策经济增速下降相对最慢,实行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同时又不延迟退休的经济增速下降最快,而放开生育但不延迟退休和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但延迟退休这两种方案下的经济增速处于中间。从不同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人均产出角度看,如果要放开生育政策,必须同时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否则从对人均产出提升的效果看比不上维持生育政策和退休政策不变。上述这些发现对新常态时期我国人口战略调整、退休制度改革具有广泛的政策实践意义。当然上述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在移民政策不变,生育外生,储蓄内生,资本贡献份额和技术进步不变,要素是同质的,要素市场是有效的,储蓄等于投资,养老金不存在闲置,同时也不考虑随机因素冲击以及货币因素等假设条件下得出的。放松上述假设条件进行研究是文章进一步延拓的方向。

在实施生育放松政策的同时,配合延迟退休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只进行生育政策调整而延迟退休不变,会出现“远水解不了近渴”的结果,这是因为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的增加具有滞后效应,一般在20年后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在这之前还会消耗储蓄,降低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只延迟退休年龄而保持生育政策不变,短期来看的确会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长期来看会打乱正常的人口替换规律,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政府需要把宏观调控政策与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调整结合起来使用,通过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措施的配套协调,降低经济持续下滑的风险。因此,把这两个政策组合起来使用,既能对冲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人口负债”带来的经济下滑,平滑延迟退休的即时效应来弥补生育政策放松的滞后效应,又能够在长期借助生育政策调整后带来的劳动力增加提高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此外,通过城镇居民退休年龄的延迟还可以减轻养老体制并轨的财政压力,减少城镇化的后顾之忧。

尽管同步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和生育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操作层面还有以下几

个方面值得担忧。其一,囿于短期内就业创造空间有限,若未来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亟须研究的是对年轻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造成挤出效应的大小。其二,对于延迟退休的方案和路径的选择也非常重要,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因此可以考虑把温和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与符合我国国情的“结构性延迟退休”结合起来,实行“渐进式结构性延迟退休”政策。其三,老年人就业参与率存在下降之谜,如果考虑这一点,现实中的有效老年人就业率可能远低于理论上的估计。其四,即使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生育率是否会有实质性反弹也是一个问题。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现在放松生育政策,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最终可能出现“牵马到河易,强马喝水难”的窘境。

参考文献:

- [1] David E B, Jeffrey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 419 - 55.
- [2] 张熠. 内生退休年龄研究前沿[J]. 经济学动态, 2015(3): 90 - 103.
- [3] 余君军. 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D]. 北京交通大学, 2014.
- [4] 樊长科, 林国彬. 延迟退休有利于提高养老金支出和经济增长水平吗? ——一个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思考[J]. 经济体制改革, 2015(1): 195 - 200.
- [5] 邱瑾, 周涛. 延迟退休年龄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基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的分析[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5(7): 13 - 16.
- [6] 祁鼎, 王师, 邓晓羽, 孙武军.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4): 95 - 103.
- [7] 刘永平. 完全放开生育管制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7(6): 55 - 68.
- [8] 陈璋等. 关于未来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的一个证明[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5): 34 - 40.
- [9] 陆晷, 蔡昉. 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 世界经济, 2014(1): 4 - 28.
- [10] Liao J. The one-child policy: a macroeconomic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1): 49 - 62.
- [11] Barro T. and Becker S.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etrica. 1989, 57(2): 481 - 501.
- [12] 杨华磊, 黄少安, 温兴春. 60后婴儿潮退休背景下的养老和退休政策选择[J]. 经济评论, 2016(1): 53 - 64.
- [13] 古明明, 张勇. 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和分解[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12): 29 - 41.
- [14] 杨子晖.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 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J]. 世界经济, 2006(6): 37 - 48.
- [15] 黄宇. 我国城镇居民跨期消费行为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10(3): 45 - 53.

[责任编辑: 杨志辉]

Postponed Retirement, New Birth Policy of Second Child Adjustment and China Economy Increase

ZHOU Liqun^a, ZHOU Xiaobo^b

(a. Institute of Binhai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b. School of Econom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hile relaxing the birth polic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ordinate with the policy of delayed retirement.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ostponed retirement and birth policy adjustment, we find that, from the view of labor force increase, postponed retirement will produce an immediate effect while the new birth policy adjustment is expected to have a lagging effect, and the difference resulted from the comparison tends to expand first and then contract, the node of which will be in the year 2031. From the view of social burden,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postponed retirement, the general maintenance rate will decrease to a lower level and the rate of increase will be slower; from the view of the general output, the potential loss in the economy will be the least in applying the two policies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view of output increase rate, the combination of relaxing birth policy and delayed retirement will make the economic increase rate decrease the slowest; from the view of output per capita, the two policies, if applied properly, will make the income per capita increase considerably.

Key Words: planning birth policy;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population dividends; birth policy adjustment; maintenance rate; economic increase; baby boom; generation imbalance